

清代官员案件处理过程中“审慎” 观念的形成及具体表现

——以《卢乡公牒》中“邢治案”为例

石 泉

(青海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 青海 西宁 810000)

摘要: 清代法律对官员审理案件需要注意的事项有着严格的程序性说明, 要求其对审理结果承担相应的个人责任, 目的在于避免司法过程中发生冤假错案并确立民众对国家法律的公信力。在这种“法官责任制”原则的影响下, 官员随之对可能影响案件结果的证据因素坚持一种“审慎”的处理态度。其中清代《卢乡公牒》中“邢治案”的司法过程, 明确了主审官员在分析案件时着重从哪些方面提出合理怀疑并如何进行思考和辨析, 进而以此为切入点实现案件结果的客观公正。

关键词: 卢乡公牒; 法官责任制; 程序正义; 审慎观念

中图分类号: K248; D9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 - 5639 (2019) 05 - 0085 - 05

DOI: 10. 14091/j. cnki. kmxyxb. 2019. 05. 015

The Formation and Concrete Performance for the Concept of “Prudence” in the Process of Officials’ Dealing with the Cases in the Qing Dynasty —Taking the Case of “Xingzhi” in *The Official Documents of Luxiang* as an Example

SHI Quan

(Faculty of Humanities, Qinghai Normal University, Xi’ning, Qinghai, China 810000)

Abstract: The strict procedural description is given for the matters that need to be paid attention to officials’ dealing with the cases, demanding the officials to take on the individual responsibilities for their judging results. The purpose is to reduce the numbers of the wrongful convictions in the judicial process and gradually establish the credibility of national laws for the public.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is “judge responsibility” system, officials adhere to a “prudent” approach to the relevant evidences that may affect the final outcomes of the cases. According to the judicial process of Xingzhi Case in *The Official Documents of Luxiang*, it is clear of the presiding officers’ reasonable doubt, consideration and analysis for the cases, and furthermore, the objective fairness of the case results can be realized.

Key words: official documents of Luxiang; judge responsibility; procedural justice; concept of “prudent”

公牒又称判牒, 是地方官员在审理案件时所留下的记录性文件。通过这些文字材料可以较为清晰地了解到具体案件的审理经过、结果以及主审官员对于案情的分析和解读。《卢乡公牒》是庄纶裔(庄纶裔, 江苏阳湖进士。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三月任, 资性明敏, 颇具干济, 尤雅爱士类。岁时课业必亲为, 甲乙提拔奖借不遗余力。时邑人

博高第者多出其门。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调离, 旋复任。)^[1]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至三十一年(1905年)间任山东登州府莱阳县知县时所经手案件的集中汇编。通过对其中“邢治案”的整个过程进行思考总结, 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庄氏本人作为案件主审官是如何在“审慎”观念和“法官责任制”双重标准的影响下, 对前任的处理

收稿日期: 2019 - 08 - 29

作者简介: 石泉(1989—), 男, 黑龙江双鸭山人, 博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明清史研究。

结果在常情、常理、常识等多方面进行合理质疑,从而使最后得出的结论更为趋近事实真相。

一、案件初审——“程序正义”与“结果正义”的矛盾表现

据《卢乡公牍》^[2]“上抚宪袁因县民邢治命案前任研讯未确据实请予平反禀”中载: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八月十四日,庄民邢桂馨向官府投告,称:十三日晚,其叔邢化、其侄邢治与在为其收割祭田过程中与同族亲属邢桂曾、邢桂盛、邢桂廷三人发生矛盾并导致互殴,其中邢治在打斗中被“铁锨殴砍致伤倒地”,不久便伤重死去。当地县令刘昌禄^①在接到报案后立刻带领仵作到现场例行尸检,经确认邢治正面颅骨有斜长一寸八分、深五分刀状伤痕一处;另外右脸颊有斜长一寸五分阔六分木器击打伤一处,除此外尸身表面再无其他伤痕。还了解到参与斗殴的另一方邢桂曾头部有铁器伤一处,左手腕有木器伤一处;邢桂盛头部、左胳膊及左手腕处各有铁器伤一处,邢桂廷额颅有铁器伤一处。而对于邢治的致命伤由谁造成这一关键问题,邢桂廷等均辩称当时人多手杂不知是何人所为。而刘昌禄认为邢治之死虽与邢桂盛等人有关,但同时考虑到邢家三人也有伤在身,两难之下只能先将之暂时收押,等到伤愈之后再行确定由谁对邢治尸身的致命伤承担责任。

此案是一起典型的多人斗殴伤人致死案,过程并不复杂。但其中涉及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即如何在法律程序规定的框架内实现对案件结果“推鞠得情,处断平允”的最终目的。换言之,也就是说严格遵循案件审理程序性方面的相关规定能否到最后必然实现相对客观公正的处理结果?一般情况下,人们通常愿意相信,案件的真相只有一个,司法官员必须努力寻找并证明这个真相。而为了让官员不“偏离”这一“目标”,就需要条文对案件处理的方式及行为予以导向性、限定性的文字说明,由此便出现了“程序正义”^②的概念。但现实情况往往却

是严格遵循程序要求的司法过程到最后并不必然会保证得出的结论能够有效维护各方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也就是说,“结果正义”并不是程序根基下自然生成的“果实”,案件结果“无枉无纵”的背后,实际上有着包括程序正义在内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

以本案为例,《大清律例》中规定地方官员在接到命案投告后必须尽快与仵作同赴案发现场对尸体进行检验。“凡(官员)初验尸伤,若牒到,托故不即检验,致令尸变;及不亲临(尸所)监视,转委吏卒……及(虽亲临监视)不为用心检验,移易、轻重、增减尸伤不实,定执致死根因不明者,正官杖六十……仵作、行人检验不实,罪亦如之。……”^{[3]442}故刘昌禄“带领刑仵亲诣如法相验,据仵作验报已死。”的行为符合当时法律的规定。^③接下来据前述案情可知邢治为多人互殴过程中被击打致死。法律对此规定:“独殴曰殴,有从为同谋共殴。临时有意欲杀,非人所知曰故。共殴者,惟不及知,仍只为同谋共殴。此故杀,所以与殴同条,而与谋有分。”^{[3]453}在明确了案件性质后,下一步便是确定案中人的责任承担,此处法律同样要求“凡审理命案,一人独殴人致死,无论致命不致命,皆拟抵偿。若两人共殴人致死,则以顶心、凶门、太阳穴、耳窍、咽喉、胸膛、两乳、心坎、肚腹、脐肚、两胁、肾囊、脑后、耳根、脊背、脊膂、两后肋、腰眼,并顶心之偏左、偏右、额颅、额角,为致命论抵。”^{[3]454}

就本案而言,法律程序在此处要求主审官需认定被害人(邢治)正面颅骨的伤口(致命伤)是斗殴过程中何人所为,而对于直接致人致命者,清代法律进一步规定:“凡斗殴杀人者不问手足、他物、金成刃并绞[监候]……故杀者斩[监候]。”^{[3]453}也就是说在整个案件的处理过程中,对承审官员每一步骤的行为,法律程序都尽可能地给予明确且严格的说明和限定;不过随着审理进程的深入,官员同样会因此陷入程序规定的两难矛盾之中。即主观

①刘昌禄,顺天大兴禀生,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六月署任。可以确定在庄纶裔到任前一年,莱阳县由刘昌禄暂摄原任。

②程序正义严格来讲属于法律范畴研究问题,其强调司法适用的程序规则或援引的法律条文符合法律规定或法律原则,要求司法过程公正,依法定程序进行,尊重和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也就是法律执行和法律过程的形式正义。

③法医学著作《洗冤集录》规定:“诸尸应验而不验,或受差两时不发,或不亲临视,或不定要害致死之因,或定而不当。各以违制论”。

上案件审理者虽然希望确认“殴杀人者”，以实现“结果正义”的要求。但同时法律亦指明：“凡官司故出入人罪，全出全入者，以全罪论；若增轻作重，减重作轻，以所增减论；至死者，坐以死罪。若断罪失于入者，各减三等；失于出者，各减五等。”^[3]⁶²¹也就是说，刘昌禄无法完全依靠程序规定查明案件真凶以实现结果正义的目的。反之刘氏如果审理结论有误，代价很可能是遭受到来自程序方面同样的刑罚（斩、绞）“反噬”。这就使得刘昌禄到后来“覆讯终无确供”。只能简单依据死者亲属邢桂馨、邢化的控词认定邢治之死系邢桂盛砍伤所致。

总而言之，程序正义虽然有其自身的独立性和法律价值，但对于实现结果正义这一目的而言，二者实际上并没有绝对的因果联系。在古代司法环境下，程序正义应首先被视为对审理者自身进行规制的准则。本案开始刘昌禄尚能大体遵循“程序正义”的相关规定，但后来逐渐无力调和前者与“结果正义”和“法官责任制”三方之间的矛盾关系，到最后仅凭“呈控定案”可视作是一种利弊权衡后的外在表象。^①也就是说，结果正义的实现通常需要官员在程序之外依靠个人能力对案情掌握、证据搜集、涉案人关系等多方面坚持“审慎”态度并超越合理怀疑，才有可能实现主观决断无限接近客观公正的目的。

二、案件再审——“审慎”态度的具体表现

“审慎”，意指做事周密而慎重，偏重于对外部行为的评价。具体到主审官员则要求其在案件的处理过程中对案情的分析必须达到毫无疑义的程度；对案中人物的相互关系必须做到确实明了；对证据的搜集和掌握必须实现完整齐备；对相关法条的选择和运用必须能够准确熟识，等等。并在此基础上不断接受来自内心和外部环境两个方面的质疑进而“超越并排除合理怀疑。”^②只有如此方能在实现“结果正义”目的的同时又不违反“程序正义”

的要求，并使最后的裁决尽可能达到古代司法语境下“信谳”的标准。

具体到本案，庄纶裔在接手案件后即对刘昌禄仅凭死者亲属的呈控就认定邢桂盛有罪的做法提出质疑。他首先认为“必须先将起衅根由与下手情形切实讯明”；其次，应辨明“何伤部位致命最重？为何人、何器所伤？”并“究明何人持何器械”；然后“向执此械之犯追起凶器与伤比对”，如果“长阔深浅分寸相符”，“则死者为何犯致死案情方有把握定谳。”庄纶裔认为，对人命案的处理应首先从案由、致命伤、致命凶器几部分入手，进而确定案犯身份。这样可以在动机、物证、有无法外特殊情况等各方面间形成完整且有说服力的证据链条。如此相较于仅凭死者一方口供定案的做法显然更具有客观性和说服力。

首先，庄纶裔在“起衅根由”方面提出质疑。认为既然邢治不过是代为收割祭田，为何邢桂曾、邢桂盛、邢桂廷三人会无故阻拦？同时即便是产生分歧也应与田主邢桂馨理论，何故与邢治发生殴斗？另，邢桂馨之叔邢化当时是同在现场收割？还是后来参与斗殴？庄氏认为这些问题“原呈既未叙及、承审者亦未究明、似此起衅根由已属种种悬虚。”对于探明案件起因这一问题，实际上已经超出了“程序正义”文字表达方式所能涵盖的最大范围。清代法律无法做到在条文中用同一且固定的标准进行说明，往往需要官员依靠个人的司法智慧并结合具体情境进行思考。一般而言，许多案件的外部观感和实际情况间存在很大的出入，最突出的表现即是不合常理性，不为人们的基本思维逻辑所接受，^[4]这通常成为官员对案由进行质疑的初始诱因。

其次，庄纶裔对案中“致命重伤之凶器”的处理方式提出质疑。他认为检验尸身前应先向参与行殴之人（邢桂廷等）究明何人所持和器械。特别是对于死者邢治的两处尸伤更应及时“追起凶器”，并与伤

①值得注意的是，清代法律对官员出入人罪有故意和过失两种不同的处理情况。在过失情况下要求“断罪失于入者，各减三等；失于出者，各减五等。并以吏、典为首，首领官减典、吏一等；佐贰官减首领官一等，长官减佐贰官一等科罪”。审错案和故意枉法裁断的责任承担是并不相同的。这就使得主审官到最后往往习惯依据简单的线索确定认定案件结果，如此相较于完全没有证据支撑主观结论。更易于在最后责任认定时被归入过失情况，进而实现减轻自身的所受罚则的目的。

②关于“超越并排除合理怀疑”这一问题，学界代表性论著有：魏晓娜《排除合理怀疑之哲学基础与程序保障》；徐忠明、杜金《谁是真凶——清代命案的政治法律分析》。

口进行对比。而原禀只有“伤取凶器铁锹比伤相符一语并无铁锹为何人呈出,亦无伤取何物木器比伤相符字样,可见当场未经究及木器一伤。”另外,庄纶裔注意到邢治正面颅骨尸伤系为刀刃所砍,而铁锹“刃宽且厚,并不锋利”,如是铁锹砍伤则“原验斜长断不止寸余,阔更不仅五分”。故得出“尸伤与凶器未确,案情之疑实固不待言。”作为斗殴致死案件处理不可或缺的证据形式,检验报告历来被主审官员所重视,“狱事莫重于大辟,大辟莫重于初情,初情莫重于检验。”^[5]除了对主持、参与检验人员的资格认定;致命、非致命部位进行细化区分;违检情况的责任分担外。在伤痕检验方面也已形成较为科学的认识,认为伤痕的比对需考虑凶器、伤痕部位、人的作用三个方面。例如“用小刀子自割,只长一寸五分至二寸等论之类,须将物之轻重大小,伤痕之浅深宽窄,人之情形势力,三者比对轻勘,并与《洗冤集录》论无异,方能吻合。”^[6]不难看出,庄纶裔正是从尸伤与致命凶器之间的比对这一环节发现不符合之处,并进而对整个案件提出合理怀疑。对于尸体检验的“审慎”态度具体表现为,首先要确定尸身的致命伤在何处,进而明确该致命伤由何器物所造成,在与伤口进行比对无误后应及时查明该器具为何人所使用,以及有无法律规定的其他特殊情况。整个过程既要求主审官员熟悉具体条文内容的相关规定,同时又对个人主观勤勉、细致的态度能力提出了较高的要求。特别是在伤口与凶器的比对这一环节,稍有疏忽和懈怠都可能会导致最后形成的结论偏离“结果公正”的目标。

另外,庄纶裔对刘昌禄接手案件后对双方当事人的处理方式提出质疑。认为刘氏仅因邢治之死就将邢桂廷等收押,却忽略了对邢桂盛三人所受之伤应由何人进行责任承担的问题。庄氏认为刘昌禄“既未取邢化等保辜限状,亦未将邢化等暂押以候。”一旦邢桂盛三人中“有一因伤毙命邢化等事后脱逃,必致彼造应抵有人而此造无人拟抵,又将何以期折服原断未免顾此失彼。”清代法律规定斗殴案件应在获取口供之后,同时为保辜处分。所谓保

辜,“谓殴人未致死,当立限以保之,保人之伤,正所以保己之罪也。”同时明确“凡保辜者,责令犯人医治,辜限内皆需因伤死者,以斗殴杀人论。”也就是说,庄氏认为其前任在案件细节和前后的处理上缺乏长远的思考和准备。忽略了一旦有人在辜限内死亡,实质上和邢治的情况并无不同。^①而没有在先前收押两方当事人的行为,将会增加后期追责过程的难度,不利于结果公正的实现。

应当明确,本案只是“审慎”态度的部分表现。实际案件处理过程中主审官员还会受到诸如礼法冲突、社会责任、自由裁量权等诸多因素的影响。^[7]但必须明确的是,“审慎”作为一种个人能力是无法用程序性的法条文字形式去对司法者进行有效规制的。首先,法律程序规定和案件审理过程均以实现“结果正义”为总目标,如若最后得出的结论被证明有误,自然违背了“程序正义”和“结果正义”的双重要求,本人亦将受到“法官责任制”的否定无疑;但同时法律程序的内容也仅是在“如何审案”“案件审理的步骤”及“审理过程中应注意的事项”等方面进行文字规定,并没有(也不可能)对通过现有程序如何实现“结果正义”的方式和途径进行说明。但却与之相对的在“审错案需承担何种责任”方面通过法律条文进行了细密的罗列。表现为无力提供实现目标的方法,却预先明确了目标无法实现的责任。这就使得地方官员一方面要遵从国家在案件处理程序方面的规定,以保证司法审理过程的“程序正义”,同时又要兼顾“结果正义”总目标的实现并承受来自“法官责任制”的压力。所以说,“审慎”态度实际上是三方矛盾作用下的产物,目的在于更好地在法律规定的框架内提升司法能力,进而通过“审慎”态度及具体表现,以期尽可能完成“结果正义”的目标。反之,部分官员受限于个人能力或出于私人利益的考虑,无法也无意实现所谓的“结果正义”,便转而选择在法律程序(审转制度)框架内围绕事实真相进行司法博

^①此处实际上清代法律另有规定,数人同谋共殴人致死者,直接造成致命伤的凶手处绞(监候)刑。其根源在于古中国社会传统的同态复仇及抵命思想,即一个人的生命可作为另一个人生命的替代或补偿。若结合“杀人者死”这一朴素的自然法律思想,即可得出剥夺他人生命者都应视为对宇宙和谐秩序的破坏。而要恢复宇宙的和谐秩序,只能通过同等的方式进行偿还。故本案中庄纶裔实际上就是在保辜规定的要求下,考虑到致死情况发生时,以实现形式上“对等性补偿”的要求。

弈，^[8]以逃避“法官责任制”下可能将会承担的个人责任。^①

三、案件反思——司法能力失位 对“结果正义”的影响

通过“邢治案”的审理过程可以发现，法律条文本身并不能与具体案件完全匹配，法律仅仅是对最一般的情况做出了规定，而每起案件都有其自身的特殊性。所以法官若不具备必要的综合知识与能力则无法良好的适用法律。同时，法官本身一般都兼任行政官员，在司法过程中，除了本应考虑的法律效果外，还需顾及社会稳定，地方教化，民众情绪等诸多因素。^[9]因为传统社会文化中的“无讼”观念只是一种理想政治下的预设与构想，然“民生而有欲，不能无争，争则必有讼”。也就是说，诉讼依然有其存在的理由和价值，自然也是民众用来解决矛盾纠纷的主要方式之一。而政府为了保证国家法律的公信力并使民众对诉讼手段抱有持续的信任感，自然需要对法律具体执行者提出一定的标准和要求。否则长期的司法不公将会导致“私力救济”大行其道并最终影响社会统治的稳定。^[10]故处理案件已经不是单纯的法律适用问题，而是与完成朝廷使命，实现地方良好的治理目标相结合。这就使得官员的司法能力成为影响“结果公正”与否的重要因素。

不过实际情况却是由于缺少必要的司法能力培训体系，大部分官员通常不具备独立分析处理案件的能力。就本案而言，进行现场验尸需要有高度专业化的技术和丰富的实践知识，这是那些仅靠文章经史、凭借科举入仕的官员所无法胜任的。所以针对这种情况，州县长官大都配有掌握一定专业法律技能的僚属官，以协助其处理司法事务。但问题在于这些衙役地位非常低，薪水微薄，不可能既有知识又有技巧，而且还经常收受贿赂。^[11]因此官员不仅不能完全依靠他们，甚至还必须在工作过程中对这些人进行有效监督。根源在于清代在获取法律知识上缺乏制度性的保证与规范，造成了效果与程度因人而异。虽不

能完全断言各级官吏不具备基本的案件处理能力，但大多数人的主要知识构成仍然停留在应对科举考试时的儒家经义。而对于律令条文、定案条例、司法程序方面的专业知识是极其欠缺的。如果不能在这方面有所弥补，这些人是不可能胜任司法审判工作的。

总之，“审慎”态度是实现案件审理“结果正义”的有效前提，表现为对司法过程细节方面坚持并超越合理怀疑。其出现的原因部分来自于程序规定以及“法官责任制”的压力影响，但同时受限于个人能力或出于私人利益的考虑，相当数量的案件审断结论无法保证结果的正义性，此时官员往往会在前述的压力下选择尽可能地维持现有结果的正确性并阻挠对事实真相的发现，以避免影响本人的仕途发展，这也是清代冤假错案数量多且难以平反的重要原因。

〔参考文献〕

- [1] 王丕煦，等.（民国）莱阳县志 [M]. 台北：成文出版社，1935：744.
- [2] 刘俊文，主编. 官箴图书集成：第9册 [M]. 合肥：黄山书社，1997：544-547.
- [3] 佚名. 大清律例 [M]. 张荣铮，刘勇强，金懋初，点校. 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3.
- [4] 王新霞，任海涛. 清代法官司法智慧研究 [J]. 兰州大学学报，2016（1）：135.
- [5] 宋慈. 洗冤集录 [M]. 高随捷，祝林森，译注.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1.
- [6] 郭成伟，主编. 官箴书点评与官箴文化研究 [M]. 北京：法制出版社，2000：160.
- [7] 吴春雷. 中国古代法官制度研究 [M].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8：233.
- [8] 石泉. 正义的分析：以清代“杨乃武”案为例分析中央与地方的司法博弈 [J]. 宁波大学学报，2018（3）：77.
- [9] 任海涛. 清代基层法官的综合素质及启示：以司法判牒为材料 [J]. 法学杂志，2012（3）：143.
- [10] 王忠春. 清代无讼思想研究：以秩序建构为视野 [D]. 天津：南开大学，2010.
- [11] 瞿同祖. 清代地方政府 [M]. 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186.

①该案后经邢桂馨供认，邢治之致命伤确不是斗殴过程中邢桂盛等三人所为。邢治早年贫困，被邢化、邢桂馨叔侄收养，并常年为其帮工。而邢化一家与邢桂盛兄弟三人先前因祭田划分问题互有矛盾。恰在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八月十三日中午，两家因祭田内豆禾分割产生纠纷，并导致斗殴。邢治在拉架过程中误被邢桂廷手中木棒碰上右脸颊，并在当晚不知被何人砍伤头颅身死。邢桂馨等人见此情况便借机诬告邢桂盛等三人在斗殴过程中导致邢治身死，从而引出本案。